

对中国近代史主线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林华国教授访谈录

李卫民

导 语: 中国近代史主线问题, 长期聚讼不已。1980 年代以来, 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传统派的观点, 受到了来自黎澍、李时岳等人的挑战。黎澍、李时岳学派的观点“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事实上, 这两派各自的观点, 都有与史实相抵触的地方。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探讨, 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 回到历史本身, 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 进行恰当的理论分析。已故邵循正教授的研究成果, 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 值得借鉴。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华国先生, 长期从事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的研究, 是中国近代史主线问题论证的亲历者, 他的专著有《义和团史事考》(最新修订版名为《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 和论文集《近代历史纵横谈》, 在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

林华国教授简介: 林华国, 1935 年生, 江西九江人。1953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毕业后留校任教。1950 年代末, 担任邵循正先生的助教。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的研究和教学, 在北大主讲本科生课程《中国通史》的近代部分, 研究生课程《义和团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退休前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代表作为《义和团史事考》和《近代历史纵横谈》。

访谈时间: 2007 年 3 月 19 日

访谈地点: 北京大学林华国教授住所

(采访者李卫民简称李, 被采访者林华国教授简称林)

李: 林老, 您看最近关于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争论, 好像又被炒起来了, 最近有人写文章, 说在比较了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论之后, 还是觉得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 要更好一些。您对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林: 中国近代史的主线问题, 或者说是主要问题, 这最早是毛主席提出来的, 和我们当前争议有关

的, 是他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问题是, 一个帝国主义, 一个封建主义, 两座大山, 使中国社会很难前进, 老是落在西方后边, 当然过去也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呀, 那早就有, 但是在史学界影响比较小。解放后, 史学界很长时间内是“两个过程论”, 胡绳呀, 范文澜呀, 当时绝大多数近代史专家都采用两个过程论, 一个过程就是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相结合, 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 两种力量的斗争形成了近代史的主线。一种力量在阻碍中国前进, 一种力量, 也就是人民的力量, 在推动着中国社会前进。但是还有一种观点,(解放后) 沉寂了一段时间, 不大被人注意, 但在史学界其实有影响的, 这就是在抗战前夕, 蒋廷黻提出来的, 认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能不能近代化, 能实现近代化, 我们就有希望, 不能实现近代化, 我们就没有希望。后来的争论, 其实就是这两种观点的继续。“近代中国的两个基本问题说”, 也不是刘大年的, 胡绳早就说了。中国正统的历史学家, 他们都是看毛主席的书, 看毛主席有什么说法, 然后按照这个方向, 提出一些具体观点。他们在大问题上

收稿日期: 2007- 08- 30

是不会创新的。我曾经说过,这些正统的历史学家,一个大问题就是搞教条,遇到新问题,先看看经典著作上是怎么说的,他们老怕自己说错。胡绳有自己的特点,善于思考问题,特别很注意对方提出了什么。

再倒回去说吧。蒋廷黻的观点和咱们国家的正统观点,是抵触的,谁先谁后呢,那应该说是蒋廷黻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的。蒋廷黻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强调中国应该先集中力量走近代化的路,不要急于反抗强敌的侵略。毛主席一再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像西方那样走在近代化前列呢?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碍。那个时候,中国的进步史学界都是学习毛主席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接受蒋廷黻的观点。蒋廷黻讲这些话,是在抗战前夕。他还明确提出来,中国作为落后国家,要反抗先进国家的侵略,必败无疑。当时这种观点影响并不大。后来,这种观点成了黎澍、陈旭麓等人观点的鼻祖。这个学派的真正鼻祖是蒋廷黻,不是黎澍。蒋廷黻提出这个观点,正好赶上了抗战,当时群众强烈要求抵抗,他在那里说,我们要先学习西方,现在我们还没有现代化,怎么去打日本?当时,这种言论,老百姓能接受么?凡是考虑群众情绪的历史学家,谁能去宣传这种观点?谁宣传谁挨骂。谁欢迎?当时,蒋介石欢迎。蒋介石后来也说,他刚开始不抵抗,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中国落后。抗战开始后,蒋介石的说法也改变了。

李:当时好像胡适之先生也有相同的观点。

林:胡适么,他又不大一样,他是说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贫穷和愚昧,怎么解决呢?也是学习西方。他认为,搞反帝反封建斗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这方面他和蒋廷黻是一致的。胡适的这种观点在史学界影响不大,他是在社会上影响大。

李:最近,我看到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蒋廷黻先生是学陈恭禄先生,在蒋廷黻之前,陈恭禄先生有一部《中国近代史》。陈先生的这部《中国近代史》,也是运用了很多国外的资料,而且,用的比蒋廷黻先生还要好。

林:我对陈恭禄的书没有注意,对他和蒋之间的关系,谈不出什么来。但是陈恭禄的影响,绝对没有蒋廷黻大。黎澍这派的学者,譬如陈旭麓,就是很赞赏蒋廷黻,并没有人提陈恭禄,有些人不提蒋廷黻,却把他的观点抄来,当作自己的观点,假装成是自己的“创新”。这种做法不好。

蒋廷黻的观点,当时在进步史学界是被不屑一

顾的。解放初、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一直到 1960 年代初,有人给洋务派翻案,就用了蒋廷黻的一部分观点,说中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近代化,洋务派搞的就是要实现近代化,是符合历史要求的。黄逸峰、姜铎等人写了一系列文章,他们的文章出来以后,震动很大,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强调革命,强调反帝反封建,过去把洋务派定性为卖国的、媚外的,所以很容易就把这一派给压下去了。但这是表面现象,这是因为政治环境,造成了史学争论的胜负,不是通过很认真的学术争论,你翻翻当时的文章,多半是政治上的大道理。从学术上来看,当时反驳黄逸峰、姜铎的文章,多半写得还不如黄逸峰、姜铎好,没有摆出很具体的史实、引证很翔实的史料来反驳。“文革”结束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不一样了,过去老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主要是强调现代化。阶级斗争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只剩一点点残余,现在宣传阶级斗争没意思了。李时岳他们说,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以前是讲阶级斗争,讲反帝反封建,那时这么讲是正常的;现在是搞现代化,你讲那些,讲那一套,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就得重新来。现在讲历史要围绕着现代化这么一个中心思想来讲。黎澍讲近代史,就是把近代史讲成一个近代化的历史,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么一条线。后来,李时岳把黎澍那个比较概括的讲法,给细化、具体化了,他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理论和具体论述。黎澍一派后来能占优势,很大的功劳是李时岳的。黎澍是领导者、指导者,不能低估他的领导作用,但是具体地分析问题、解决分歧问题,压倒胡绳那一派,主要是靠李时岳。你看,传统的观点,一个一个都谁驳倒的?都是被李时岳驳倒的。驳到什么程度,胡绳、金冲及等传统派的代表,对李时岳都表示口服心服。后来胡绳呢,他 1990 年在一篇文章中说,近代中国,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怎样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另一个就是怎样使中国实现近代化。前面你说这是刘大年的创新,我就觉得刘大年不可能有这样的创新。毛主席去世以后,刘大年是紧紧跟着胡绳,亦步亦趋。你看近代史研究所出的那个《中国近代史稿》,那纯粹就是在发挥胡绳的说法,胡绳一些很荒唐的说法,说百日维新是洋务派的维新,实际上把戊戌维新运动否定了。《中国近代史稿》也跟着这样说。

李:我想插一句,您刚才好像一直没有提到陈旭麓先生,陈先生在1980年代也是一大重镇吧。

林:陈旭麓在史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真正把传统观点搞得很狼狈的是李时岳。陈旭麓他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譬如战与和,他谈了很多。但你光靠这些搞不倒传统观点。“两个过程”是传统学派的根基,胡绳、范文澜等的理论基础。李时岳一下就把这个根儿、这个基础给你挖了,你“两个过程论”是不对的。毛主席并没有说两个过程,毛主席讲的是中国怎样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过程当然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就讲的是这个,然后就讲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怎么回事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不答应,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你要这样做,我们和你对着干。他并没有讲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两个过程,可是,胡绳那一派呢,就把“两个过程”说成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这样一来,中国近代史就简单化了,就把近代化排除在中国近代史主要内容之外了。

其实,中国近代史的过程是多方面的。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也有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也有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搞了一些近代化。文化呢,也从封建的变成了半封建半西方的文化。

李:您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李时岳先生是在哪几个问题上集中攻倒了范胡学派。

林:最关键的就是,推倒了“两个过程”论。“两个过程”论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过程是负面的。另有一个过程,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是正面的。这两个过程,一正一负,反帝反封建是主线。可李时岳说了,这个分析不对,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成是负面的,这个变化本身包含了负面正面两个方面,正面的就是半封建化,半封建化就是半资本主义化,近代化。这不是很好么?近代历史就是半封建化与半殖民地化之间的斗争,谁是进步的呢?半资本主义化。这样一来,近代史的主线就是半资本主义化、近代化,而不是反帝反封建了。他提出这些观点以后,你看看那些文章,胡绳、范文澜一派基本上闭口不言了。后来,胡绳本人也表示,我觉得用现代化作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这种办法

是可行的。

李:这是胡绳先生什么时候表得恣?

林:就是在1995年他那本书再版序言里。

李: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吧。

林:对。

李:好像胡绳先生说,他还没有见到用现代化史观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

林:这是带点儿挖苦的话,那时候黎澍那一派是写了很多文章挖苦胡绳,挖苦得很凶。胡绳说,按照你们的那一套来写近代史,我承认是对的。可是你们得把你们的那一套想法写成书呀!你说你那一套好,可你又写不出书来,你老是说我这一套不行,得扔掉,你又写不出新的来代替。既然如此,我这一套书,我还要保留。

李:林老,那您谈一下您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大作的看法吧。

林:这是胡绳的第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以前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写得很精彩,但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著作。但这部新作,从学术水平看,我认为不值得过高评价。黎澍那一派已经给他概括了,那一套书的确是在用阶级斗争史观来写近代史。他那套书从头到尾都是在讲阶级斗争,提到经济的很少很少,我的印象是不到十分之一,而且,他提到经济的时候,也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谈经济,完全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谈经济。象讲资本主义的产生,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写,哪一部分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哪一部分的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不是先具体研究经济,然后再从政治上分析。他一开始就是从政治着眼,来分析经济。黎澍那一派,主张近代化史观,完全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近代史,这种观点也不行。双方似乎都不大清楚什么叫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肯定,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他不停留在这儿,他不只看到阶级斗争,还指出在阶级斗争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决定它,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然后就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讲阶级斗争不能离开生产力,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胡绳派和黎澍派,一派只讲阶级斗争,一派只讲生产力,争得还特起劲,我是想,双方都应该好好读读马克思的文章。这两派各自强调一个方面,忽略另一个方面。一派专讲近代化,另一派专讲阶级斗争。近代化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都是把唯

物史观简单化、片面化了。斯大林讲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太简单化了。他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就必然出现什么社会,那这个社会发展变化太简单了。变成简单的公式了。过去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政治运动。这也是简单化、庸俗化。举个例子吧。很多学者在分析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总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先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在上层。既然先发展起来的是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最初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必然是代表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行动必然是软弱的、妥协的。这好像挺有道理的。其实这都是推论,不是从实际出发。你看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算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呀?有人强调谭嗣同和他的那些伙伴儿在湖南办了一些资本主义企业,说他们成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所以要求改革。这完全是牵强附会。康有为、谭嗣同这些人原先都是封建知识分子,他们走上维新的道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成了资本家,而是因为他们想救国,觉得过去的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怎么办呢?他们觉得唯一的出路是学西方。他们当时对西方的理解也比较肤浅,先办些企业吧。他们是先想救国,想学习西方,然后才去办企业,不是先变成资本家,才想去搞改革,他们是把办企业作为他改革活动的一部分,来改变社会。他们的改良思想是怎么来的?不是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出来的。爱国就要进步,就要学习比我们先进的东西。不是因为他是资本家,就想搞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李:听您这么一说,很受启发。请您再回头说一下洋务派的问题吧。李时岳先生的论述重点是在洋务派上面。

林:给洋务派作辩护,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没有李时岳,给洋务派作辩护的人照样也很多,否定洋务派的人也抵挡不住。但是有了这个李时岳的理论呀,他把半封建半殖民地从理论上一分为二,半封建是进步的,你说洋务派搞得企业,有封建的东西,它是半封建的,这没关系,但半封建本身是进步的,它还有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它总比封建好。李时岳这样一讲,传统派胡绳他们就没办法了,你看关于洋务派的争论,传统派的主帅、主将们都一言不发。

李:像张国辉先生,功力相当深厚,他的《洋务运动和近代企业》,这部书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为什么张国辉先生没有在这场争论中表态。

林:他喜欢搞具体的,他对搞理论不感兴趣。你像《洋务运动和近代企业》这本书,内容很丰富,很扎实,但他没有提出多少自己的新的观点。对洋务派,传统观点的学者中,分析得比较透彻的,只有一个人,邵循正。

邵循正先生,既有理论,又掌握许多确切的史实,他掌握了旧学者的那套功夫,在搜集史料、搞考证等方面,有很深的功力。旧学者没有理论分析的那一套,他有。可惜他的文章极少,他讲洋务派的(文章)主要是有两篇。

李:这两篇文章是在什么时候发表的?

林:在 1960 年代。

李:1980 年代正统派里面就没有出现过邵循正那样的人?

林:没有没有。时代不同了,现在很难再出现邵循正那样的学者。就像中国古代史队伍中很难再出陈寅恪一样。

在 1960 年代,黄逸峰、姜铎这些人给洋务派翻案,列举了很多洋务派具体的功劳,办了些什么洋务企业呀,跟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类比,那这些呢,比较浅薄,这两个都不是搞历史出身的。

李:包括姜铎?

林:他过去是干革命的,长期在部队里,解放以后,他对历史比较有兴趣,搞了一些文章。邵循正当时不想跟他们辩论,这两个人当时最出风头的,但是,邵循正写文章是冲着汪敬虞去的。

李:邵先生写文章是冲着汪敬虞去的,汪敬虞先生当然是大腕儿了。

林:汪敬虞和邵先生比,他还是后辈。但邵先生对他很看重。汪敬虞在这些后辈当中,是一个比较拔尖的。和邵先生一辈的,搞经济史最出名的是严中平,还有孙毓棠,这些是老的,汪敬虞当时算是年轻的。汪敬虞的确是搞得好,后来他的声望超过了孙毓棠。1960 年代,人们知道的,最有成就的就是汪敬虞。

李:吴承明呢?

林:吴承明的年纪可能比汪敬虞要大一些,他是跟着许涤新搞《中国资本主义史》。他过去不大以学者的身份独自出来活动。

搞经济史的,一拨儿人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是搞学术的,另外有一拨儿象许涤新、薛暮桥这些人,他们在国务院,他们主要是起咨询作用,他们以

前不大写学术著作,偶然写点,是要宣传政府的政策。他们都是一流专家,但他们不大写学术论文。许涤新、薛暮桥他们在“三大改造”的时候,把政府的作法给讲出来一套道理来,他们的任务不是搞学术研究、搞经济史。后来,他们搞《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那是系统的经济史,确实是下了很大功夫。

李:哦,邵循正先生写文章是对着汪敬虞先生的。

林:汪敬虞呢,他不像黄逸峰、姜铎一样把洋务派捧得那么高,黄逸峰、姜铎他们的文章一看是政治味的,没有多少史实叙述的东西,更没有考证,就是从政治结论出发,从人家的著作里找一些材料,然后,就从大的方面去分析,日本的明治维新,大家都认为是进步的,那么洋务派也就是进步的。汪敬虞是搞学术的,他是先从具体的史实入手,把具体的事情搞清楚,再来分析。汪敬虞并没有一下子把洋务派捧得那么高,但是从具体的分析来看,他觉得洋务派的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们办的企业,有进步作用。这是一种搞学术的做法,在学术界影响相当大。黄逸峰、姜铎他们是站不住的。明治维新是维新派先把那个腐朽的旧政权推翻了,所以,他们的改革能成功。洋务派不触动腐朽的反动政权,当然搞不成功,而且,具体来说,做法也不一样。汪敬虞呢,他从具体史实来分析。邵循正对他的文章很重视,你说说洋务派按具体史实说是进步的,可是你把一些重要史实搞错了。

邵循正在我们系里给学生讲课,一条一条地反驳汪敬虞,讲了几个星期,学生全都没听懂,“邵先生要讲什么呀,说那么多很琐碎的事儿。”后来我去找邵先生,“邵先生,您把那课暂时停一下吧,学生都说没听懂,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儿”。我占用他一堂课时间给学生讲了一下,目前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焦点是什么,汪敬虞的观点又是什么,邵先生为什么要反驳汪敬虞,一条一条详细地反驳。学生这才明白了。邵先生的水平同学生差距太大,他善于同水平高的学者讨论,不善于给学生讲比较复杂的问题。他不习惯通俗地、系统地讲课。

汪敬虞说机器织布局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应该是进步的。邵先生说,那得具体考察一下,看织布局最初是怎么提出来的,办它的目的是什么,怎么筹备的,怎么慢慢建成的,织布局为什么一直搞不好。还有那个招商局,他写得没有张国辉那么细,但是抓住

了要点。最初筹备时,李鸿章就决心要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个跟张国辉分析的一样。但是控制在他手里,他手下的人没那个本事,筹备了一年,搞不起来,因为他们不懂得轮船运输这一套,他们和商界也缺乏联系,资金募集不来。李鸿章不得不接受盛宣怀的建议,聘用了唐廷枢、徐润这两个买办来筹办。唐廷枢当时在怡和洋行当总买办,还管理着轮船公司,那绝对是内行,唐廷枢、徐润在中国商界也很有影响。唐廷枢当买办当了好多年,他帮助怡和洋行筹集资金,把轮船公司办起来了,他还参加了经营管理。在洋人那边干事,洋人把中国人当奴才,他当然不甘心。李鸿章拉他,就讲,我们这个轮船公司是官督商办,官只起个监督作用、保护作用,办还是商人来办,那唐廷枢当然高兴呀。你让我来办,我就可以施展我的才能,我就可以实现我一生的抱负,谁愿意低声下气地给外国人干事。唐廷枢是辞去了怡和洋行总买办的职务,对他个人来说,那是个很大的牺牲呀,从个人收入来说,肯定是少多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还是决定离开怡和进入招商局。辞职,出来了。他提出的条件,就是,上边儿不要派人来干预企业里的事,企业就是我来管,李鸿章表面上批准了。唐廷枢上任以后,定了个章程,规定在招商局里,由股东先选举董事,董事再来选举企业的领导人,从章程上看,这绝对是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但是李鸿章并不真正按这个章程办事。李鸿章当时不能不用唐廷枢,可是我不让董事选你,而是由我任命你。选你,那你就是代表股东了,我任命你,你是代表我的。唐廷枢却以为,你为我,我就是负责人了,现在还在招股,我只是个筹备人,招了股,才能开股东会、董事会,现在股还没招,我就已经是正式负责人了。这也挺好。李鸿章还给了他一个道台头衔。这是封他官儿。当时普通人当道台很不容易,你就是考上了状元,开头顶多当个知府,做得好慢慢才能升成道台,你一个买办一上来就是道台,够优待了。等唐廷枢把招商局办起来,正常运转以后,李鸿章就变脸了,你这个“总办”也叫“商总”,是管商务的。我还要另外派人去管“官务”,管官务的人向我请示汇报。那个盛宣怀就是被派去管官务的。唐廷枢对盛宣怀并不警惕,他自己是盛宣怀推荐的,是他的好朋友呀。后来,权力慢慢就转移到盛宣怀手里。盛宣怀先把徐润干掉,搞得徐润非常狼狈呀,不但官儿丢了,而且很多财产也被人家没收了。盛宣怀还没有对唐廷枢下手,唐廷枢就

已经害怕了。乖乖地自己辞职了,权力都到了盛宣怀那里,然后李鸿章给盛宣怀的官名也不叫总办了,改叫“督办”,又督又办。从整个的过程来看,开始时表面的有一些民族资本主义的味儿,到最后,是露骨的官僚资本主义。邵循正厉害就在这儿,分析得又深入又十分具体。

李:林老,您讲的这一段儿,是邵先生的成果,还是您的?

林:基本上是邵先生的,也有一点点是我的。邵先生不讲这么细,他要说太细了,同学就更听明白了。邵先生这个人看问题很深刻,涉猎的也很多。他不习惯于通俗地、更系统地讲问题,而是只具体地讲一些要点。他写的文章也有不少人看不明白。他写的那个《中国史纲要》近代部分,不少人都看不明白。

李:近代部分是邵先生执笔的?

林:这部分是邵先生和陈庆华两个人署名,主要是邵先生写的。太简略、不够连贯。学生跟我说,这书我们看不明白呀!他写书不大考虑读者的水平。比如,我和你聊天儿,说胡绳在学术上主要是跟毛主席跑。刘大年是与胡绳,我跟你这么说两句就行了。我跟一个没学过历史的谈话,就得先介绍历史学界这一派有哪几个著名人物,胡绳什么地位,刘大年什么地位,然后再说他们之间什么关系。跟你说,两句话就行了。邵先生写东西,常常是没头没脑的,突然就冒出来一个人,一件事,就像跟学术界一个熟人聊天一样,他也不介绍这是怎么回事,也不说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人。

李:林老,您能不能再介绍一下邵循正先生,他功力很深,但是现在越来越不被人提起。

林:邵循正,是一位解放前就已经成名的著名学者。他的特长就是能把很多复杂的事情通过详细的考证把它弄清楚。那时学界的风气,是不怎么搞理论分析的。解放以后,在新的环境里面,他很注意搞理论分析。他写文章也重分析,和范文澜、胡绳他们不一样,他不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给毛主席的话作注解。对胡绳、范文澜等权威学者的说法,他也从不人云亦云。他是根据最基本的具体事实,来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说,对戊戌维新派这些人的分析,范文澜是从大的理论观点出发,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发动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进步的运动必然是民族资产阶级搞得,民族资产阶级又分

上层、中下层。搞改良的必定是上层,搞革命的必定是中下层,他这是一步一步推论出来的。邵先生呢,他是从对改良派的主要人物进行具体分析入手,康有为原先是个封建学者,后来看见国家要亡了,要想办法,这个时候,西方的书传进来,他一看,他们的确有些东西比我们先进,他又到香港去了一趟,呃,英国人管的香港比我们这儿清政府管的要好,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考察,他慢慢产生了要改良的思想。改良派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封建官员和封建知识分子中爱国的、进步的那一部分,你看看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不是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他们都是首先从救国出发,想通过改革来改变中国的状况。不是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出发,提出改良主张。

李:邵先生的主要著作就是他的那部史学论文集?

林:他最初写的成名作是读硕士时候写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李:哎呦,这好像早就绝版了。

林:是。他那本书的观点可能有些旧了,另外还涉及到越南的问题,过去,中国传统的看法把越南当成是中国的藩属,这样写出来的中越关系,越南就看不下去了。现在如果再出,那前面还得加一篇长篇序言,说明一下。怎么写?谁来写?人民出版社一直想再版,但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很难,一直没出。那本书,是他读硕士的时候写的,那时候当然很年轻。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

李:那他跟着谁读硕士,他的导师是谁?

林:蒋廷黻。后来出国,跟法国的伯希和学过,伯希和对他非常欣赏,他有才呀。他知识渊博,考证也行,分析也行,外语特别好,聪明过人。

他那聪明到了什么程度?他跟伯希和学的时候,伯希和讲课,大家都不满意,都反映老师讲的根本听不懂。伯希和就一笑,说:“你们当然听不懂,现在我讲的课,是为邵循正讲的,你们能听懂么!”当时,学生中,很多是法国人,伯希和的意思,我有邵循正这样的学生,我得按他的水平来讲课,别人当然听不懂了。

他这人的才能非常高,可惜的是,他搞学问,觉得是很轻松的事,从年轻时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懒散。读硕士时写的书,《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公开出版后,日本的杂志上就有评论,说中国史学界新出了

一批高水平的东西,其中一本就是邵循正的书。你想一个硕士生写的东西就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李:而且日本人的眼界也很高。

林:日本人对中国史学界的情况很了解。他们把这本书挑出来作为中国史学界的突出成果,说明邵先生的确聪明过人。

李:可惜他不愿意下苦功夫。

林:他搞研究从来不需要像一般人那么下苦功夫,所以他就懒散惯了。他解放以后只出了一本薄薄的论文集。他的学问比一般人大多,可是他的论文集比一般人薄得多,你看看,好多篇还是他的讲稿,他去世后,为了出他的论文集,请张广达帮他整理成文章的。张广达也是很聪明的,他是邵先生晚期的入室弟子,邵先生曾经个别指导过他一段时间。后来他到了美国。

李:除了您和张广达先生,邵先生的学生还有谁?

林:最重要的弟子是陈庆华,他已经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64岁,比他年龄大得多的,地位高得多的,七、八十岁的著名学者,听说他去世了,都说,“啊?陈庆华去世了?太可惜了!那么大的学问!”比他年纪大的,很多人都受过他的帮助。陈庆华这个人呀,知识特别渊博,近代史学者中没人能比得了,邵循正也比不了。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看书,古今中外什么书都看,而且记性特殊的好,邵先生也常常要问他。有时候,邵先生写文章要引用某一条史料,这条史料过去看过,但是忘了在哪本书里,也不知道哪里找得到,就把陈庆华叫去问,陈庆华马上就能说出在哪套书的多少卷,第二天就从图书馆给借来了。陈庆华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了,随便问他什么,一般都能立即回答。那些老学者,为什么在他死后都那么惋惜,对他那么感谢,那么夸奖?老学者的记忆力不行了,有的时候要用某条多年前看过的材料,忘了材料在哪里,这条材料太好了,特别想用,就问陈庆华,他都能给找到。

李:邵先生的弟子,还有么?

林:你说的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广义的弟子,如果听过他的课的都算,那就太多了。狭义的弟子,指当过他的研究生,受过单独指导,或当过他的助教,个别接触较多的,这样的弟子就不多了。在北大历史系的有张寄谦。近代史研究所的,还有余绳武、丁名楠等。我不大留意这些事,其他地方是否还有就

说不清楚了。

李:丁名楠先生也是邵先生弟子?

林:他还不是邵先生特别欣赏的弟子。邵循正先生这个人的眼界高极了,他主动要求留在身边的弟子只有一个,就是陈庆华。他就是看上陈庆华读书最勤奋,记忆力最好。邵先生需要身边有这么一个弟子。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善于分析问题的弟子,要分析,你分析不过邵循正。你能力再强,你想到的,我也想到了,我需要陈庆华,有些东西,我没看,他看过,有些东西,我忘了,他记得,这是他最需要的弟子。其他很多人就到了社科院了。后来他聊天说过,他觉得,最有出息的是那个余绳武,邵先生在近代史所兼任学术委员,他发现余绳武到近代史所以后,提高很快,他说,“余绳武如果还想(跟我)学,那最好了。”

李:邵循正先生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代大家,但现在提到他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林:我们系里的邓广铭先生,有一次在全系教师会上,突然大发感慨,说:“我们系里的老师,活着的死了的都算上,最有学问的是邵循正。”当时我们都大吃一惊,历史系公认的,最有学问的,搞理论分析的是翦伯赞,搞史料的是向达和到了社科院的张政烺,旧学问仓库呀,还有齐思和呀,那学问可大了。可是邓先生认为最有学问的还是邵循正,从古到今,他都知道。邵循正先生,元史也是大家。而且,搞史料,搞理论分析,他都很行。但是,邓先生紧接着说,可惜,这个人太懒,不写东西。那么大的学问,就留下那么一点儿文章,一肚子学问都带走了。

李:这是邓先生什么时候说的,1960年代还是1980年代?

林:1980年代。

李:邵先生是多会儿去世的?

林:是在1970年代初。太早了。有一次聊天儿,他跟邓先生聊天,聊起郑观应,一套一套的,邓先生对他说,你应该写一部书呀,研究得这么深,就写短短的小文章。可就是不写!怎么不写呢?太懒。邵先生留下的文章很少,只留下那么一点儿,为什么还留下了那么一点儿呢?几乎全是为了应付全国性学术讨论。人家邀请他参加,请求他写篇文章,迫不得已才写的。明史学会,他是副会长,吴晗是会长,吴晗说这次会议请他写篇文章,他得给吴晗面子呀,好,被迫写了一篇文章。他参加会议常常不写文章,以他的地位,不写人家也得请他。辛亥革命60周年,要开一

个盛大的学术讨论会。人家请他写篇文章,“邵先生,你写上一篇吧。”情不可却,被迫写了。就这种情况,开会前三天,还是乱乱的一堆草稿在那儿堆着。他派人到我家里,把我找去,对我说,“过几天我要去参加讨论会,文章现在还是草稿。”(那文章草稿)还在那儿乱堆着呢,也没有分段,他这人,想到哪儿就写到那儿,想起个什么问题就把这个问题写一写,而且还缺最后一段呢,就是总结,他说,“我最讨厌写总结了。”他写的文章都没有总结。他的文章没有篇头语,也没有那个结尾。

李:上没有天,下没有地,只有中间的东西。

林:他一上来就没头没脑地说他要说的。很多人看他的文章很不习惯。我在那儿被他关了三天,饿了就吃,吃完晚饭再干一会儿才回去。改完以后,我也很头疼,应该是提前一两天,拿出个稿子给邵先生看一下,他还得拿去审阅,得改呀。但是邵先生一万多字的文章,既没有段落,也没有结尾,我得看他这篇文章到底讲了哪几个问题,应该怎么分段,第一部分写什么,第二部分写什么,哪些内容放在总结里面,考虑好了再整理,整理完了,他也快动身了,写完了,给他,请他审阅,他看都不看一眼,塞到行李包里就带走了。他对写文章就是这么不重视。

李:这篇文章的题目您还记得么?

林:《辛亥革命期间的农民问题》。

李:收入他的论文集了么?

林:收入了。

李:武汉大学的石泉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他当年的毕业论文《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也出版了。您注意到了没有?

林:这部书我看过。前几年,刘桂生拿了一大堆书稿,到我家来,让我看。

李:对,那部书是刘桂生先生作的序。

林:刘桂生是我的好朋友,那位作者和他是老同学,比他还大一些,请他看稿子,刘桂生说,他多年不搞近代史了,这不好弄,又不好拒绝,让我帮帮忙,需要加工的地方加加工。我认真地读了一遍。我说,这部书我不能加工,他总的一个观点贯穿下来,你动这个不动那个,那不行呀,你动多了,那不是他的东西了。在现在这个环境里出版这部书,观点有点不对,没关系。这部书史料很扎实,有出版价值。现在既然蒋廷黻的书都出了,他的书也应该能出。

李:石泉先生的书,受到了好评,大家都说这部

书代表了陈寅恪先生的近代史观点。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您能谈一谈么?

林:对陈寅恪的东西,我知道得很少,不好评价。我和他,是隔一代的人,我只知道陈寅恪非常了不起。你看他的学生,像周一良、汪钱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看问题都很有见解,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都以陈寅恪的弟子而自豪。这些人成名以后,都忘不了自己是陈寅恪的弟子,大师呀,就是不一样。

李:石泉先生的书里面,很多涉及到了李鸿章。这几年,对李鸿章的评价,争议较大,这方面的高水平的成果也不多,想听一听您的见解。

林:对李鸿章这个人呀,我是这样看,要讲许多具体事儿,讲他的能力,办具体事情的能力,当时找不到第二个人能赶上他,但是,他总的指导思想,非常糟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从大的方面来看他,不能只注意具体的。举个例子,你讲学问,康有为比得了梁启超么?差远了。他对西方的研究,比得了严复么?那更是差远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讲到维新派,第一号就是康有为,他在大的方面的确特别高明。梁启超、严复在研究很多具体问题方面,水平比康有为高。但康有为的高明之处是抓住了根本的问题,要改革中国的这套制度,要搞改革运动,不能光搞学问不解决现实问题。他的《新学伪经考》,从纯学术角度来看,很多地方是胡说八道,但是从大的方面看,了不起。他要动摇旧制度的思想根基,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他提出来以前,梁启超、严复会想这个东西么?不会。他提出来以后,严复仍然不同意。研究西方的立宪制度、共和制度,严复比他研究深入得多。讲西方那套道理,严复比他讲得好得多,但严复不能把这些用到中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梁启超呢,对西方也知道很多,但也没带头提出要在中国搞那一套。看人呢,得看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他抓住了没有。

李鸿章那个时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受他们压迫,不反抗就没有出路。而他呢,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错了。他是主张,先实现近代化,“必先尽其所能,方能夺其所恃”,是说你就要把西方的都学到手以后,才能和西方对抗。这个地方错了。你想,你一个受人压迫的国家,你能够“尽其所长”吗?这是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呀,从李鸿章到蒋廷黻,都解不开;胡绳在理论上也解不开。胡绳晚年谈近代中国的两个问题,他说,落后必然挨打,挨打了就更加落后,把落

后和挨打说成是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怎么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先解决挨打问题?他们都认为行不通。你落后就必然挨打。先解决落后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对的。但事实证明,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想赶上帝国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从世界被压迫民族翻身的历史看,都是先在落后的条件下敢于反抗强敌,摆脱被压迫地位,取得独立,然后才能变先进。即使在独立以后,要赶上先进国家,也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能不能摆脱离落后——挨打——更落后的恶性循环,关键是要敢于在落后条件下反抗强敌。斯大林说,落后必然挨打,必然打败。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在战争中,落后的一方必然比较困难,损失比较大,但并不是必然失败。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证明,先进者虽然有很大优势,但最后不一定能取得胜利。说应该先搞近代化,人家已经骑到你身上,你怎么近代化?你说一个高手把你打趴下了,他骑在你背上,把你抓过去,给别人干活,当苦力,你说我学好本领就打败他了,你没有机会学他的本领!近代中国已经被人压着,你近代化只能到一定程度。比较先进的技术,他根本不给你,他不教给你。直到现在,你要学他的最先进的,他也不给你!你只能是在独立以后,站起来以后,自己想办法,自力更生。毛主席的这个观点,现在很多人讽刺,说他不学习西方,闭关自守。其实毛主席说,凡是能够学的,有机会学的,都要尽量学。刚解放,讨论要不要收回香港,有些人说,派一点军队去,英国人就得跑。毛主席说,收回来很容易,但是不要急着收回来,留下一个窗口,跟西方联系。你要想做买卖,你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香港是个重要的通道呀。毛主席留下个窗口,就是想学习,但是人家不肯跟你来往,不让你学。解放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美国大使赶走,想跟美国建立联系,但美国政府命令他回去,美国不想跟你来往。毛主席一再想办法跟留在美国的美国人联系,但他们得不到美国方面的批准,不敢跟我们联系。没办法。后来是抗美援朝,美国用海军把中国封锁起来。把中美关系整个给堵死了,不是我们要堵死,他要堵死啊!那毛主席怎么办?一个,一边倒,倒向苏联;一个,自力更生。现在的一些人呀就说,毛主席闭关自守,不肯对外开放,不肯向西方学习。在当时,谁能拿出比毛主席更高明的办法。

李鸿章是在根本问题上错了。他不知道中国首先需要取得独立,取得独立以后才有办法,通过各种

渠道进步,独立以后,他不能再压住你了,那时候他再想限制你就比较困难了。比方说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帝国主义非常仇恨它,想扼杀它。但是,苏联战胜了外国武装干涉,站稳了以后,开始搞工业化的时候,谁给他的技术?谁给他的资金?还不都是西方国家。它扼杀不了你了,接下来只好承认现实,跟你做买卖。苏联存在在那里,是一个大市场,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十分严重,迫切需要市场,美国就抢先了。你英国不是不跟他合作么?这个机会我要,苏联当时进口的许多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不都是从美国来的么?

李:关于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理论,在近代史界很有影响,他的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崇。您好像和他有不同意见。

林: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核心就是一元多线历史观。有人说,这是他的重大创新,不是这么回事。我对西方了解得很少,但我知道的,他这套是从意大利学者梅洛蒂那里学来的,至于梅洛蒂是从谁那里学来的,我就知道了。我搞历史是很不合格的,缺一条腿,很重要的一条腿。我不会外语。研究中国近代史,史料从哪里找?很重要的史料在外国。

李:不是在中国?

林:中国有很多史料,但是许多关键性的史料在外国。你研究近代每次对外战争是怎么起来的,光用中国的史料搞不清楚。发动战争的都是外国,他们为什么要发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可笑的说法。有人说,外国本来不想打中国,是因为有很多时候,中国错误地对待外国,才引起了战争。蒋廷黻认为,英国本来不想打,是你的禁烟搞得太过火了。事实是怎么回事?英国人早就准备要打,禁烟运动之前,他们就用侦察船在中国的海岸线整个走了一圈。禁烟运动之前,他们早就在具体分析,怎么个打法,他们说中国沿海有不少炮台,好像很坚固,他们就研究这些炮台是怎样布置的?怎么打就能把这些炮台打下来。他们研究得很细。这些都是英国政府的人?不是。有些是鸦片贩子,有些是传教士。可是这跟英国政府没关系么?他们是给英国政府出谋划策的。后来实际上英国政府很重用这些人。英国政府内部有没有官方的正式研究,得再看。从现在已经翻译过来的外文资料可以知道,鸦片贩子和外国传教士作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把他们的建议书都送交英国政府了。后来,英国政府发动战争时,就采

用了他们的一些建议。

李: 咱们再回来说一下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

林: 罗荣渠他外语很好, 他写东西, 总是引用很多外国人的言论。但是, 凡是跟他的观点有很密切联系的, 他不告诉你。梅洛蒂这本书, 他在书里尽量不提。私下聊天, 他对梅洛蒂非常赞赏。他为什么在书里不介绍梅洛蒂的书? 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 他的一元多线历史观是从梅洛蒂那里来的。梅洛蒂说, 人类社会的发展, 不是象斯大林所说的那样, 按照一条线顺序地往下发展, 他说是多线, 实际上他说的是两条线, 一条线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 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一条线就是原始社会瓦解后, 变成“亚细亚社会”。他说, “亚细亚社会”是一个不能突破自己圈圈的社会, 它自己不能演变成一个新的社会。几千年如此, 再过多少年也没希望。怎么办呢? 必须有另外的一条线上的国家来“帮助”他。这另外一条线是按上面所说的那几个阶段走的, 他说, 这一条线, 是有生命力的, 是能够自己向前发展的, 这条有生命力的线上的一些国家发展成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来打你, 来统治你, 来改造你, 把你那个亚细亚社会给破坏掉, 把你变成半资本主义社会, 最后也会发展成社会主义。最后, 就是殊途同归。但是, 怎么从半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儿他打了个马虎眼儿, 不具体说。梅洛蒂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不能把社会主义给抹掉, 否则, 就不象马克思主义了。他说, 亚细亚社会, 变成殖民地是好事, 最后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他这就是说, 我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罗荣渠呢, 把梅洛蒂的一套给搬过来了, 又发展了, 他把金观涛的一套也套上去。金观涛有个超稳定系统论, 在青年人中间, 影响非常大。但他不是搞历史的, 在史学界没有什么地位, 年纪又轻, 是罗荣渠的晚辈。罗荣渠用了他的理论, 对他却一字不提。其实, 金观涛的理论在学术圈以外, 影响非常大。他讲超稳定系统, 把现代西方的系统论给搬过来了。在中国搞历史的, 多半不知道什么叫系统论。人家把最新的系统论的思想用来研究历史, 你能不服气? 他说, 中国社会是个超稳定的, 只能在破坏——修复——再破坏中不断循环。罗荣渠把这个拿过来补充梅洛蒂的亚细亚生产关系理论, 他说, 即使中国社会不是亚细亚社会, 而是封建社会, 并且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还是不行, 还是不能自主地向前发展, 变成新的社会。因为你这个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

统, 变来变去还是在原先的圈子里转。只有外国打进来, 你才真正变。

李: 为什么罗荣渠的这套理论, 一出来就很快轰动了呢?

林: 从来源来说, 他基本上都是梅洛蒂的理论, 而不少学者对梅洛蒂是很佩服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就很佩服梅洛蒂。我遇见过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 他说搞了几十年历史, 看了梅洛蒂的书, 才知道过去咱们搞的都错了, 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人家梅洛蒂的每一个观点, 都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作根据, 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再一个, 金观涛讲系统论, 中国史学界多数人都不懂, 没法跟人家辩论, 我们过去搞的, 很多是教条, 而且是斯大林的教条, 人家却是创新的。罗荣渠最后的结论是, 中国这类国家, 不能独立自主地向前发展, 必须有外国来打你, 统治你, 改造你。这恰恰迎合了“文革”以后的思潮, 认为过去强调反帝, 那是极左的, 现在咱们强调的是向西方学习。有人还认为, 当先进国家的殖民地, 比当落后的独立国好, 对独立自主地发展没有自信心。还有, 罗荣渠他提出来, 历史发展, 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到底往哪儿发展? 这个谁也不知道, 它完全是偶然的, 一个社会变成另一个社会, 是多种偶然因素的巧合, “特殊凑合”。他以英国为例来分析。他说英国当时有很多很特殊的偶然情况, 凑合到一块儿了, 就凑合出了英国资本主义。中国在清朝中期已经是封建社会后期了, 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 但没有那么多偶然性因素“奇特地凑合”在一起, 你就变不了。只能等着先进国家来打你, 征服你。他说, 各国的历史, 都是很多偶然因素“凑合”出来的, 没有什么发展规律, 没有什么共同的发展顺序。社会与社会之间, 也没有什么先进与落后之分。你主观地排出个顺序来, 那才有先进、落后。可是, 历史本来是无序的、偶然的。有一次纪念会上, 他发言, 咱们要反对教条主义, 要破框框, 最大的一个框框, 就是五种生产方式, 最后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他讽刺说, 马克思一百年前宣布说,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过了这么多年, 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也没灭亡。谁垮了? 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一个垮了。资本主义是越来越繁荣, 社会主义国家却一个一个跨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 这是一种思潮。它不是孤立的, 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很多人赞同他的观点, 自己却说不出来, 他们当然十分佩服他。

这些年,还有一些人的观点,也很奇怪!李泽厚批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激进派。有的学者在反驳时说,李泽厚否定革命,当然也反对激进派。孙中山怎么是激进派?乱扣帽子!激进难道都不好吗?季羨林和那些盲目崇拜西方,妄自菲薄的人相反。他宣传东方文化优越论,说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说,今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将引领世界发展的新潮流。他说,东方文化从根本上说,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从局部看问题。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从全局看问题。他这一套影响也很大。可是,这一套真有什么道理么?哪有只分析不综合,只综合不分析的文化?分析与综合是紧密结合,不可能相互分离的。不分析何来综合?不综合何来分析?季羨林还断言,西医不如中医。他说,西医是治标,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治本。中医是治本,头痛医脚。这符合实际吗?实际上,中医的原则是“忽则治标,缓则治本”。所谓治标,就是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来缓解一些紧急症状,如发高烧、大出血等等。在症状紧急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必须先治标,而不可能把这些紧急症状先放在一边,就全力去“治本”。所谓“治本”,就是去掉病根,把疾病从根本上治好。西医治天花,采用种牛痘增强免疫力的方法,不但治好了千百万天花病人,还把天花这个长期威胁人类生命的可怕的传染病基本上消灭了。这难道是治标不治本?西医治阑尾炎,把阑尾切掉,难道也是治标不治本?什么人见过中医用“医脚”的办法来治头痛?

李:李时岳先生在去世前曾说,他没时间写一部《晚清史》了。陈旭麓先生是在他死后,学生整理出版了《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还有胡绳先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范老也有一本《中国近代史》上册,最近,李剑农先生的著作《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史》重新出版了。您心目中理想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什么样的面貌?

林:写历史,首先是要实实在在地做学问。过去有一些老学者写东西,尽管他某些观点并不一定对,但他是认认真真搞学术的,所以他很多史实写得比较具体,比较实在,现在看看也很有好处。从蒋廷黻开始,包括范文澜的那些近代史,都是政治性的历史,不是学术性的历史,他们是先有个政治上的想法,我要你接受一个政治思想,我要把它立起来,再选择一些对我有用的事例来论证那个政治思想。范

文澜,本来是研究古代史的,他写中国近代史,纯粹就是上面交的政治任务,要他通过历史来论证毛主席的反帝反封建理论。胡绳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是上面交的政治任务,他想写成学术著作。但他长期写的都是政治性论著,习惯了。写出来仍然是政治性的,学术味比较差。他还是适合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那种书。那本书是政论性的,写得很精彩。你要写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就得首先在弄清史实上下大功夫,把史实尽量弄清楚,弄准确。你很多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大发议论,这有什么用,对读者有什么好处?胡绳的书想宣传义和团是爱国的,反帝的,力量是很大的。但他说的很多都不符合史实。他说,义和团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控制了北京城,但他们不去把清朝推翻,反而被清朝利用了,去扶清。他具体研究过义和团的历史么?没有。范文澜说义和团力量很强,清军“每战必败”,没办法了,只好承认它合法。义和团不知道这是阴谋,被清政府欺骗了,利用了,还去“扶清”。胡绳也是这类说法。另一些学者则说,义和团是乌合之众,根本没有什么力量。清朝如果真想消灭它,用不了多大力量。是清朝想利用它来排外,暗地里支持他,它才发展起来了。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史实。义和团真要说打仗,那它打不过清朝军队,几千人打不过一营正规军。但清政府想消灭它,没门。军队一来,他把头巾一摘,武器收起来,下地干活去了。你怎么抓?清军一走,他们又聚在一起活动了。过去流行的这两种说法,都是不研究具体历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李时岳他们提出要用近代化史观来写近代史,我觉得,阶级斗争史观是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近代化史观也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都行不通。要写新的晚清史、中国近代史,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的历史观来写。首先要搞清楚历史是怎么回事,要把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搞清楚,把阶级斗争形势变化的原因搞清楚,把阶级斗争具体的发展变化状况搞清楚。近代中国的线索呢,主线是反帝反封建。不同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队伍组成和领导成员不同。为什么不同?必须具体分析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洪秀全提出的那个纲领,主要是反映农民要求土地的思想。后来,太平天国个别领导人接触外国人更多了,知道中国比外国落后了,想学习西方,洪仁玕提出了《资政新篇》。为什么行不通?那就是他在国内没有社会基

础。你的周围基本上是农民,你跟农民讲这些,农民能接受你这一套吗?这是行不通的。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实践,表现出社会上发生了变化。中外交流多了,知识分子多起来了,一些人对外国的情况了解得多了。他们想寻找救国的路,于是想学习外国,这些人多数并不是资本家,不是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你硬给他往上套,他主张改良,他就是资产阶级上层。这么套是不行的。革命派,主要是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多半不是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你要研究这个社会。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斗争。要从具体的客观的史实中来研究,像邵循正那样。历史研究主要是把历史如实地说出来,让老百姓知道,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要

用你的观点去改编历史、曲解历史。“文革”时,有一个著名人物叫迟群,当过文革小组的科教组长。他说,搞历史应该是“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为当前政治服务”。现在,一些鼓吹“近代化史观”的人,搞的实际上就是这一套。当今的现实是搞现代化,我们讲历史就是要立足于现代化,去“追溯”历史上可以用来宣传现代化的东西,对宣传现代化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不管在当时的历史中是多么重要,那都不必讲。按照这种指导思想,讲秦始皇主要讲修驰道就可以了(这可以联系到当前的修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岳飞、戚继光都不用讲了。这叫什么历史?

[责任编辑 孙晋浩]

Some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Clu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n Hua-guo

LI Wei-min

相关链接

邵循正,字心恒,生于1909年,福建省福州市人。1926年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1930年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蒋廷黻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专攻中国近现代史,1933年毕业,毕业论文为《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他写这篇论文,不仅使用了大量的中方原始档案,还博采英美法等国的第一手资料,并将政治学方法引入外交史研究,得出了不少新见。邵循正先生的这篇论文,是蒋廷黻先生在清华历史系大力提倡的“多种语言,多种方法,多国档案”治学方法的完美体现,一时广受好评。1934年,邵循正先生因课程成绩和论文均为优秀,由清华大学历史系资送出国,赴法研修,攻读蒙古史。他先后在法兰西学院东方学院和德国鲁尔学院学习研究,接受了蒙古史研究训练,掌握了古波斯文、蒙古文,很受当时法国著名中国学学者伯希和教授的赏识。1936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5年,赴英讲学,任牛津大学访问教授。这一阶段,他专攻蒙古史,由于掌握中外多种文字,并能熟练运用对音方法,因而成就卓著,是国际知名的蒙古史专家。邵先生194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之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他还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即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

后,他逐渐受吴晗、范文澜影响,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点也转移到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而又侧重于近现代中外关系史。这一时期,邵先生发挥自己的才华,为新中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一)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余绳武、丁名楠、李时岳、林华国等人,都曾接受过邵先生的指导。以余绳武、丁名楠为主要撰稿人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在写作时就受到邵先生的指导,推出后,颇得史学界好评;(二)推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如《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问题》、《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论官督商办》等,都是质量很高的论文;(三)主持编辑了多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资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中法战争》(七册)、《中日战争》(七册)两部大型资料集,均由邵循正先生主编。中华书局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也是由邵循正先生积极推动并组织编辑的,其中的《夷氛闻记》,就由邵循正先生整理。此外《〈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中俄关系历史资料选辑》等重要资料集,也都是由邵先生组织编译的。“文革”开始后,邵先生受到批判,后去参加“二十四史点校”中《元史》部分的工作,积劳成疾,1972年4月27日逝世。《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